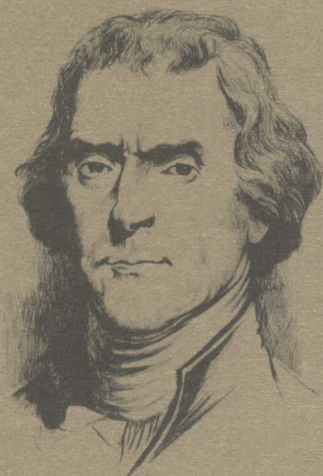




杰斐逊自传

[美] 托马斯·杰斐逊 著
朱曾汶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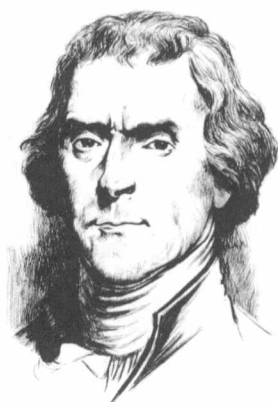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014313562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K837.127

243



杰斐逊自传

〔美〕托马斯·杰斐逊 著

朱曾汶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北航

C1700194

K837.127
24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杰斐逊自传/(美)杰斐逊(Jefferson, T.)著;
朱曾汶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ISBN 978-7-100-09870-0

I. ①杰… II. ①杰… ②朱… III. ①杰斐逊,
T. (1743~1826) —自传 IV. ①K837.12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5790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杰斐逊自传

[美] 托马斯·杰斐逊 著

朱曾汶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9870-0

2013年12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6 1/2 插页 1

定价: 18.00 元



北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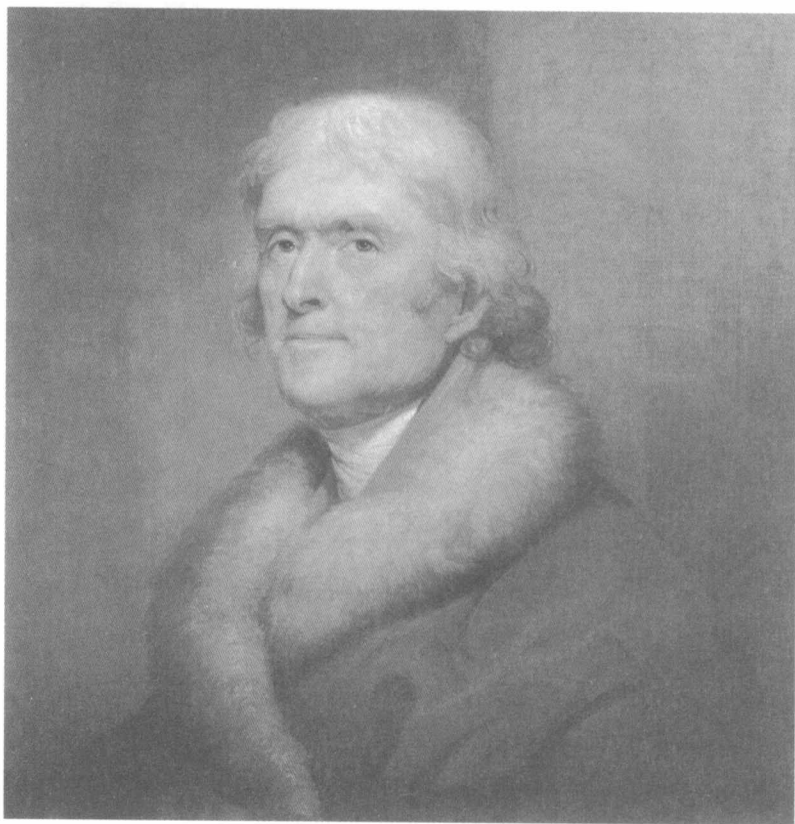
C1700194



Thomas Jefferson

AUTOBIOGRAPHY BY THOMAS JEFFERSON

中译本根据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托马斯·杰斐逊纪念会 1905 年版译出



Th. Jefferson

托马斯·杰斐逊

(1743—1826)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新版说明

本馆出版名人传记渊源有自。上世纪初林纾所译传记可谓木铎启路,民国期间又编纂而成“英文世界名人传记”丛书,其后接续翻译出版传记数十种。及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汇涓成流,结集出版“世界名人传记丛书”,广为传布。

此次重新规划出版,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续写经典、重开新篇。丛书原多偏重学术思想领域,新版系统规划、分门别类,力求在新时代条件下赋予作品新价值、新理念、新精神。丛书分为政治军事、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科学发明以及除上述领域之外的综合类,共计五大类,以不同的封面颜色加以区分。

丛书所选人物均为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的名流巨擘,他们的业绩和思想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甚至塑造了世界格局和人类文明。所选传记或运笔于人物生平事迹,或着墨于智识求索,均为内容翔实、见识独到之作。读者于其中既能近观历史、反思现实,又能领悟人生、汲取力量。

我们相信名人传记的永恒魅力将为新时代的文化注入生机和活力。我们也期待能得到译界学界一如既往的支持,使此套丛书的出版日臻完善。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2年12月

绪 言

托马斯·杰斐逊的《自传》是他在 77 岁高龄开始写的，他写这个自传的目的是供自己参考，并让家人知晓。这部著作忠实、富有启发性并饶有趣味地叙述了杰斐逊的生平经历以及他生活在其中的那个史诗般的时代，从他出生起直到 1790 年 3 月他出任乔治·华盛顿的国务卿为止。《自传》是根据笔记和备忘便条（有些几乎是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回忆、信件以及类似信息来源撰写的，偶然也有前后不一致或失实现象。例如，1787 年，杰斐逊说约翰·亚当斯在欧洲时当选为合众国副总统，实际上，亚当斯在当选前已经返回美国。尽管有这些不足之处，《自传》仍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个伟大的美国人以及美国历史上一个最意义重大的时期。

除个别较不重要的脚注或说明性材料被删去外，《自传》是全文发表的。

在 77 岁之际，我开始写备忘录，叙述一些关于我自己的事和这些事发生的日期，供自己参考，也让家人知晓。

据我父亲家里人口头传说，他们的祖先是来自威尔士，从英国最高的斯诺登山附近来到这里的。我曾经在判例汇编中看到过威尔士的一个案件，其中一个和我们同姓的人不是原告就是被告；另一个姓同样姓的人是弗吉尼亚公司的一名干事。我在那个地区碰到过这个姓的只有这两次。我在我们的早期档案中也看到过这个姓，但是在我的祖先当中我掌握确切材料的只有我祖父一人，他住在切斯特菲尔德一个叫做奥兹博恩的地方，他拥有的土地后来成为教区教会的附属地。他有三个儿子：托马斯夭折；费尔德定居于罗阿诺克水域，留下许多子孙后代；我父亲彼得则定居于目前仍归我所有的土地上，称为沙德韦尔，与我目前的住宅毗连。我父亲生于 1707/8 年 2 月 29 日，1739 年娶艾沙姆·伦道夫的 19 岁女儿简·伦道夫为妻，艾沙姆兄弟 7 人，定居于古契兰县邓琴奈斯的地方。他们的家谱可追溯到英格兰和苏格兰，每个人都把他选择的信仰和价值归因于此。

我父亲幼年失学，但由于意志坚强，判断正确，求知欲强，他读了很多书，大大地提高了自己，以致有关方面聘请他与威廉和玛丽学院数理教授乔舒亚·弗赖伊一起继续进行弗吉尼亚与北卡罗来纳之间边界的勘查工作，这项工作是由伯德上校开始的；后来又与同一位弗赖伊先生一起绘制第一张弗吉尼亚地图，以前由史密斯上尉绘制的地图仅是一张主观臆测的草图而已。他们对蓝岭下游地区拥有丰富的资料，当时对那个山岭以外的地方几乎一无所知。他是我目前居住地的第三个或第四个开拓者，时间大约在 1737 年。他于 1757 年 8 月 17 日去世，我母亲寡居一直活

到1776年，生有6女2子，我是长子。他把他在詹姆斯河畔的地产遗留给我的弟弟，这宗产业以家族假定的出生地斯诺登命名；遗留给我的的是我出生并居住在那里的土地。

我5岁那年，父亲把我送进了英语学校，9岁进了拉丁语学校，我在那里就读直至他去世。我的老师道格拉斯先生是一位来自苏格兰的牧师，在我初步掌握拉丁语和希腊语后，教我法语；我父亲去世后，我继续向牧师莫里先生——一位精通古典文学的学者——学了两年；然后，1760年春，又进入威廉和玛丽学院读了两年。当时的数理教授是苏格兰的威廉·斯莫尔博士，他对大多数实用科学造诣都很深，有可喜的传授才能，作风正派，心胸豁达，这对我实属万幸，或许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对我来说最幸运的是，他很快就对我产生了好感，学校不上课时，每日与我为伍；从与他的交谈中，我对科学的发展以及我们置身于其中的事物系统有了初步认识。我入学不久，哲学教授席位即告空出，他被委派暂时填补这个空缺；在那所学院中，他是定时讲授伦理、修辞和纯文学的第一人。他于1762年返回欧洲，在此以前他对我宠爱倍加，让他最亲密的朋友乔治·威思接受我作为他指导下的法律学生，并介绍我与总督福基尔相识，和他共同进餐，福基尔是历来担任此职最得力的一位。福基尔、斯莫尔博士和威思先生——他的两个挚友——还有我本人，结成一个四人集团，这些聚会上的习惯性谈话使我得益匪浅。威思先生始终是我青年时期忠实的、受爱戴的导师，也是我毕生最亲密的朋友。1767年，在他的影响下，我在殖民地法院当律师，我在那里一直干到革命爆发，法院关门为止。

1769年，我被我所在的县选举为议会议员，任职至革命关

闭议会为止。我在议会里曾力求通过一项解放黑奴的法案，但遭否决。确实，在帝王政府时期，任何一件开明的事都休想获得成功。我们的思想被禁锢在狭小的圈子里，习惯地认为我们必须在一切有关政权的问题上服从母国，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必须服从母国的利益，除母国的宗教外对其他一切宗教都应该坚决抵制。我们的议员的麻烦在于习惯和绝望，而不在于思考和信念。经验立即证明，一要求他们进行思考，他们就会把注意力集中到权利问题上。但是作为议会又一个院行动的国王参议会，是靠国王的意志保持他们的席位的，而且最卑贱地服从那个意志；对我们的立法有否决权的总督，也是以同样的条件任职的，对国王的意志更加忠心耿耿；而最最重要的一点是，国王掌握的否决权使每一个改善的希望都成了泡影。

1772年1月1日，我和马撒·斯克尔顿结婚，她是巴瑟斯特·斯克尔顿的遗孀、约翰·韦尔斯的女儿，时年23岁。韦尔斯先生是个业务繁忙的律师，其所以繁忙，与其说是因为他专业知识出类拔萃，不如说是因为他异常勤奋守时，办事十分麻利。他是个非常讨人喜欢的伴侣，诙谐有趣，脾气也好，在一切社交场合都受欢迎。他积攒了一宗可观的家财，于1773年5月去世，留下三个女儿，遗留给杰斐逊夫人的那部分财产，在还清巨额债务后，约等于我自己继承的财产，从而使我们富裕安乐程度倍增。

当1765年著名的反印花税法决议提出时，我还是威廉斯堡一名攻习法律的学生。不过我在下议院走廊门外旁听了辩论，聆听了亨利先生作为一位天才演说家的精彩发挥。这些演说真的非常了不起，我从任何其他那里从未听到过。依我看，他的演说

就和荷马的著作一样伟大。约翰逊先生——一位律师，来自北奈克的议员——支持了这些决议，这些决议的学识和原理主要是他提供的。我对这些事情的回忆可以在沃特著的《帕特里克·亨利传》第60页看到，材料就是我提供的。

1769年5月，总督巴特图特勋爵召开议会会议，我当时已当了议员。会议获知1768—1769年英国议会两院关于马萨诸塞事件的联合决议和给国王的呈文。议会在几乎无人反对的情况下通过了反决议以及给国王的请愿书，清楚地表明把马萨诸塞的利益看作共同的利益。总督将我们解散，但是我们次日在雷利酒店的阿波罗厅集会，志愿成立了一个代表大会，草拟了一个反对使用一切英国进口商品的联合条例，签署了这个条例，并将它推荐给人民，然后返回各自的县，并重新当选为议员，只有极少数人因为不同意我们的做法而落选了。

由于很长时间没有发生特别激动人心的事，我们的同胞们似乎陷入了对我们的处境漠不关心的状态：茶叶税至今未取消，英国议会声明有权使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受他们法律束缚的法案仍然对我们起作用。但是，1762年在罗得岛成立的、有权把在这里犯罪的人送往英国受审的调查法庭，在我们1773年春举行的会议上被认为必须予以注意。由于感到我们老一辈起领导作用的议员缺乏时代所要求的热心和干劲，亨利先生、理查德·亨利·李、弗朗西斯·李、卡尔先生和我本人同意晚间在雷利酒店的一个密室开会商讨局势。另外可能还有一二位议员参加，我记不得了。我们大家都认识到，所有措施中最紧要的一条，是与所有其他殖民地达成共识，把对英问题当作所有殖民地的共同事业，并采取一致行动；为了这个目的，每个殖民地成立一个通讯委员会

将是相互沟通的最好办法，其首要措施或许是在某一个中心地点召开殖民地代表会议，由会议负责协调所有殖民地应一致采取的措施。因此，我们草拟了一些决议，这些决议见沃特的著作第87页。参加商讨的成员们建议由我提出这些决议，但是我主张让卡尔先生来提出，卡尔先生是我的朋友和连襟，刚当议员不久，我想给他一个机会向议会显示他的超乎寻常的价值和才能。大家同意我的主张，卡尔先生提出了决议，全体议员一致同意，于是任命了一个通讯委员会，议长佩顿·伦道夫任主席。当时的总督邓莫尔勋爵解散了议会，但是委员会于次日开会，写了一封供其他殖民地议长们传阅的信，每封信中附一份决议，由委员会主席负责将信作为快件寄出。

各殖民地间的这些通讯委员会一向被认为是马萨诸塞创始的，马歇尔也犯了这个错误^①，虽然他引证的附录里的注解表明这些委员会仅仅建立在它们各自的城镇之内。这个问题在1819年4月2日塞缪尔·亚当斯·韦尔斯给我的信中以及5月12日我给他的回信中说得很清楚。韦尔斯先生在信中纠正了我向沃特先生提供的一个信息（见第87页他写的注），即马萨诸塞和弗吉尼亚两位携带同样建议的信使在路上失之交臂；韦尔斯先生说明马萨诸塞并没有提出成立通讯委员会的建议，而只是在收到我们的建议后才在他们下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因此他们那封和我们错过的信必定是关于别的事情，因为我清楚地记得佩顿·伦道夫告诉我两位信使在路上错过了。

另外一件引起我们对马萨诸塞同情的事是《波士顿港口法

① 杰斐逊这里指的是约翰·马歇尔写的《华盛顿传》。

案》，按照这个法案，该港口将于 1774 年 6 月 1 日封闭。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是在同年春天，议会正在开会。由于这些问题在下院不再由老一辈的议员做主，亨利先生、理·亨·李、弗·李、另外三四位议员（名字我忘了）以及我本人一致认为我们必须毫不含糊地大胆和马萨诸塞站在一条阵线上，并决定利用资料馆就设在会议室之便，在会议室开会，就采取适当措施进行磋商。我们深信有必要把我们的人民从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的麻木状态中唤醒，认为规定一个普遍斋戒和祈祷的日子最有可能引起他们的注意。自从 1755 年战争使我们受尽苦难以来，新的一代人已经成长，而我们还没有过这样隆重庄严的例子。因此，我们从拉什沃思的著作里仔细寻找他所保存的当时清教徒具有革命意义的先例和仪式，写了一个决议，将词句稍稍现代化，规定 6 月 1 日（港口法案将于该日开始生效）为斋戒、蒙耻和祈祷的日子，恳求上帝使我们避免内战灾难，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们的权利，并且使国王和英国议会回心转意，公正地对待我们。为了更进一步强调我们的倡议，我们商定翌日早晨去拜访尼古拉斯先生，因为后者庄重和笃信宗教的特性与我们决议的基调较为一致，要求由他来提出这个倡议。于是翌日早晨我们就去见他了。他当天就提出了动议，规定 6 月 1 日为斋戒、蒙耻和祈祷日，这个动议在无人反对的情况下被通过。总督照例又把我们解散了。我们和以前一样又退到阿波罗厅，达成一个协议，指示通讯委员会建议其他各殖民地的通讯委员会派代表每年召开一次会议，地点以便于随时对公共利益所需要的措施进行调度为宜；我们并且宣布，攻击任何一个殖民地应被认为是对全部殖民地的攻击。这是在 5 月。我们还进一步建议各县选派代表于 8 月 1 日在威廉斯

堡开会，讨论殖民地的状况，特别是要选派代表出席代表大会，要是召开代表大会的建议被所有通讯委员会一致同意的话。所有通讯委员会都表示同意，开会地点定在费城，日期为9月5日。我们回到家里，在各自县里邀请牧师于6月1日参加人民的集会，主持仪式，并向人民作适合这个特殊场合的讲道。人们都来参加集会，脸色惊慌不安，这一天的效果就像电击似地贯穿整个殖民地，使每一个人奋发起来，昂然屹立在自己岗位上。他们普遍为代表大会推选了代表。我当选为本县代表，写了几点我打算在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说明，交给将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在这个说明里，我采取我从一开始就认为是唯一正统或站得住脚的立场，即英国与这些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应该同詹姆斯即位到英格兰和苏格兰王国政府合并前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的关系完全一样，也和她目前与汉诺威王朝的关系一样，尊奉同一个元首，但是没有其他必要的政治联系；此外，并不因为我们是从英国移居来此的，英国对我们享有的权利就比丹麦和撒克逊移民使母国现统治者对英国享有的权利更大。不过，我从未能使任何人对我的这个主张表示同意，表示同意的只有威思先生一人。从“我们与英国之间的政治关系是什么？”这个问题提出伊始，他就赞成我的这种看法。我们的其他几位爱国者：伦道夫、李氏兄弟、尼古拉斯、彭德尔顿都赞成约翰·迪金森的折中办法，承认英国有权管理我们的贸易并对它征税，征税的目的是为了管理而不是为了筹集岁入。但是这个折中办法没有协定根据，不符合公认的移民原则，道理上也讲不通。移居国外是一项天然权利，一切国家在一切时候都奉行不误。我于大会召开前几天动身前往威廉斯堡，但途中突患痢疾，无法继续前进。因此我将我的两份说明草稿寄往

威廉斯堡，一份附在信中寄给佩顿·伦道夫，我知道他会担任大会主席，另一份寄给帕特里克·亨利。亨利先生是不赞成我采取的立场呢，还是懒得一读（因为他是我所知道的最懒于阅读的人），我永远不得而知；但是他没有把它传达给任何一个人。佩顿·伦道夫通知大会他从一位代表那里收到一个文件，这位议员因病不能亲自递交，并把它放在桌上让大家过目。议员们全都看了，不少议员表示赞同，尽管他们认为在目前形势下过于大胆，但是他们还是把它印成小册子，名称就叫《英属美利坚权利概述》。这本书流传到了英国，被反对党看到了，伯克先生把它略加修改，使它符合反对党的目的，以那种形式很快就出了好几版。这个消息我是从赫特牧师那里听到的，当时他正去英国接受圣职；后来佩顿·伦道夫告诉我，这本书使我获得了被列名于一张长长的公敌名单的荣誉，这张名单被列入英国议会一个院提出的剥夺公权法案，但是由于形势发展迅速，警告他们做事要多多小心，结果就被扼杀在娘胎里了。蒙塔古——下议院驻英格兰代表——把法案做了摘录，把名字抄下来寄给了佩顿·伦道夫。名字大约有20个，他逐个念给我听，但我只记得汉考克、亚当斯兄弟、佩顿·伦道夫本人和我本人这几个名字。大会于8月1日召开，重新开始了伙伴关系，指定了出席大陆会议的代表，在方式和内容上给他们作了非常温和而恰当的指示。代表们于指定的日期前往费城。第一届大陆会议的过程极其精彩，已载入史册，尽人皆知，因此这里不再赘述。大陆会议于10月20日结束，定于翌年5月10日复会。代表大会在1775年3月的会议上批准了第一届大陆会议的各项议程，向与会代表表示感谢，并重新任命同一些人代表这个殖民地出席将于5月召开的会议；由于预料到

主席兼下院议长佩顿·伦道夫可能会被召走，他们增补我为代表团成员。

果然不出所料，伦道夫先生因需出席由邓莫尔勋爵召集的、定于1775年6月1日召开的全体会议，不得不辞去大陆会议主席一职。在此之前，诺思勋爵的所谓和解建议已被总督接受，召开这次会议就是为了对这些建议进行讨论。伦道夫先生出席了会议，由于这些建议的要旨已向所有殖民地的总督宣读，尽人皆知，因此他渴望使我们会议的答复（很可能是第一个答复）符合他最近离开的一批人的意见和愿望。他担心尼古拉斯先生（尼古拉斯先生的思想还跟不上时代的节拍）会动手写这个答复，因此坚持要我来写。我写了，并在他帮助下使它在下院获得通过，尼古拉斯先生和詹姆斯·默塞尔顾虑重重，时不时泼上点冷水，多多少少削弱了它的力量，但最后还是以全票或全票只差一票通过。答复通过后，我立即返回费城，将它交给大陆会议，这是大陆会议收到的第一个答复，在那里获得一致同意。我于6月21日与他们一起就座。24日，奉命起草关于武装反抗原因声明的委员会将他们的报告送来了（我相信是J.拉特利奇执笔的），写得不好，下院于26日要求重写，并增补迪金森先生和我本人为委员。下院散会，委员会尚未开会，我正好来到W.利文斯顿总督身旁，就建议由他来起草文件。他婉言拒绝，并建议由我来写。在我的恳切要求下，他说：“先生，你我尚是初次相识，你为何非要我写不可？”我说：“因为我听说你起草了告英国人民书，这当然是美国第一大手笔。”他说：“先生，这一点可能是传闻失实。”这个消息我是在弗吉尼亚从出席大陆会议回来的哈里逊上校那里听来的。李、利文斯顿和杰伊三人是起草那个文件的